

日治皇民化時期之日語教育

何 欣泰*

摘 要

臺灣在日語學習的歷史上面，以日治皇民化時期的語言環境為最佳。從研究中，我們可以得知日治時期具備不受語言學習臨界點之限制，而達至精通日語之境界的可能。然而，當時臺灣總督府雖如火如荼地推行日語教育，實際上，臺灣人未能習得日語的人數依然不少。再者，因為授課師資、對日語的一知半解或制式教科書等的影響，而導致在日語之音韻、詞彙、文法等各方面，容易發生臺灣式日語（臺灣國語）和臺灣式日語重音（accent）之現象。

另外，本稿亦就日治時期與現今臺灣之日語教育，進行探究比較。

關鍵詞：皇民化時期、日語教育、第二語言之學習、臺灣式日語（臺灣國語）、日語重音

* 輔仁大學日文系所助理教授。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Imperialization Perio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HO Hsin-tai*

Abstract

In terms of Japa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was the best in the imperialization (Kominka) perio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From related literature, we learn that there was no language learning limitation in that period ; therefore, one could easily master the Japanese language. Though the Taiwan governor had endeavored to promote the Japanese education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till many people who failed to learn Japanese. Many teachers had no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n the language, and they restricted themselves on the textbooks; therefore, it resulted in students' Taiwanese-style Japanese (Taiwanese- style national language) and Taiwanese-style Japanese accen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will also make comparisons on Japanese education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ith that of contemporary Taiwan.

Keywords:

imperialization (Kominka) perio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aiwanese-style Japanese (Taiwanese-style national language), accent in Japanes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日本統治の皇民化時期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

何 欣泰*

要 旨

台湾にとって、日本語の学習の言語環境については、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の皇民化時期が最もよかったのである。言語能力には限界が生じる臨界期に束縛されずに、日本語をマスターできる可能性が窺われる。しかし、当時の台湾総督府により、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に推し進められる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語を習得しなかった台湾人は少なくない。それに、日本語教育者、日本語教科書や生半可の日本語の影響を受け、日本語の音韻、語彙や文法などの各方面には台湾式日本語（台湾国語）、台湾式アクセントという現象が生じやすい。

その他に、日本統治期と現在の台湾の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も、対照研究を試みる。

キーワード：皇民化時期、日本語教育、第二言語習得、台湾式日本語（台湾国語）、日本語のアクセント

* 輔仁大学日本語文学科助理教授。

日治皇民化時期之日語教育

何欣泰¹

1 前言

日治皇民化時期之開始，最早可回溯至 1936（昭和 11）年 8 月廣田弘毅內閣於〈國策之基準〉中所提出之南進論（南進政策）。同年 9 月，新任臺灣總督小林躋造發表治臺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化」後，皇民化運動便陸續展開。而以同化臺灣人為日本人的皇民化運動之中，又以推行日語教育為最。臺灣總督府當時積極推廣「國語家庭」，並強烈要求臺灣人說日語、限制本土語言之使用。其實，在殖民統治前期，日本人為免臺灣人嫻熟日語而取得較高教育機會後威脅到他們指導統治的地位，在教育制度與日語學習上多所限制²，例如在就學人數上，臺灣人就明顯地居絕對劣勢³。而這類情形卻於皇民化運動開始後，獲得相當程度之改善。

有關日治皇民化時期之日語教育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吳文星（1987a：1-31；1987b：53-86）在〈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上）（下）〉中，對「國語普及（按：國語即日語，以下同）」之教育政策之確立、「國語普及」運動之發軔、「國語普及」運動之進展、反「國語普及」運動之勃興、「國語普及」運動之強化和「國語普

¹ 輔仁大學日文系所助理教授。

² 詳見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0）。

³ 依據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頁 188 所載，1926 年底日本人和臺灣人的學齡兒童就學率百分比為 98.2：28.4。

及」運動之成效與影響，綜合性地探討臺灣總督府制定推廣日語政策之目的和經過。周婉窈（1994：117-156）在〈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中，就同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與韓國，從比較的角度探求皇民化運動的開始及其名稱問題、神道與固有宗教的問題、國語運動、改姓名運動和志願兵制度等各相關問題。周婉窈（1995：113-161）則對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歷史性地析論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蔡茂豐（2003）亦從歷史性之觀點研究 1895 年至 1945 年日語教育在臺灣的情形。

由以上可知，從語言學之觀點，探討日治皇民化時期之日語教育，分析一下當時所學日語之情形的相關研究似仍少缺，據此，筆者認為這將會是一個具有意義的研究範疇。另外，本稿亦希冀從該日本殖民政策對照一下現今臺灣社會有關日語教育之變遷與展望。

2 從語言學之觀點探討日治時期之日語教育

2.1 語言學習之臨界點

原則上，對於被殖民統治的臺灣人來說，日語為其母語（第一語言）之後的第二語言。通常，學會自己的母語過程稱之為「Language Acquisition」，中譯為「語言習得（或「語言獲得」）」⁴。第一語言之獲得，普通以四歲為其臨界點⁵。而第二語言之學習（Second Language Learning）成效的影響因素，則包含智能、適性（aptitude）、動機（motivation）、學習方式和語言環境等，較為複雜。其中，能夠客觀測量出來的，依然只有年齡⁶。只是，第二語言之臨界點存在與否，學者分成正反二派，至今仍未有定論⁷。一般仍認為越早學習越好，尤其

⁴ 沈陽，《語言學常識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36。

⁵ 平川真規子，〈第二言語習得〉，載於中島平川編，《言語の事典》（東京：朝倉書店，2005），頁 255。

⁶ 參照平川真規子，前引書，頁 257。

⁷ Johnson and Newport 1989 即指出，超過十五歲後才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人，無

在音聲、音韻之區別和發音方面，影響尤為明顯⁸。

日治時期，從一開始（1895年7月設置芝山巖學堂）至戰敗為止，日本一直致力於殖民地臺灣日語教育（國語傳習）之推廣。李園會（2005：51）指出，臺灣的教育最初即由日語的教學開始，日本人不但將日語做為教育用語，在各學科的教學中也將日語視為最重要科目⁹。雖然，日本人一直明訂暗設地施行差別化教育（如小學校和公學校、課程第一、二、三號表之區別等），但是，不管是否情願或生活有所需求，臺灣人能夠在幼少年期就能開始學習日語，乃是不爭之事實（亦有少數臺籍學生能與日本人一起學習）。皇民化運動開始後，強制推展日語的活動更趨極端，其中，例如限制本土語言的使用、國語家庭的推廣和提昇「國語解者（了解日語的人）」的政策等，對於學習第二語言的立場來看，仍具相當之加分作用¹⁰。另外，李園會（2005：696-702）指出，當時臺北帝國大學為在臺灣唯一的大學教育機構，但臺灣人的入學比例較少，1943年的統計數字顯示日本人為85.03%、臺灣人為14.44%。另一方面，日本本土的大學對臺灣人完全無任何差別待遇，因此，臺灣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赴笈日本留學。據1945年之初步統計，日治時期臺灣人赴日留學者多達20萬人，其中大專以上畢業者總數約6萬餘人¹¹。由此可知，當時確實可能有不少臺灣人能夠自由自在地使用日語，乃至於達至精通日語的境界¹²。

另一方面，卻也有像基隆市國語研究班（1932：17-28）〈話方科に於ける劣等生指導法の研究〉¹³中所述的「日語劣等生」存在。

法取得和母語同樣水準的能力。

⁸ 平川真規子，前引書，頁258-259。

⁹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頁51-56。

¹⁰ 當然，如同周婉窈（1994：171-175）所述，據調查資料顯示，1940年的「國語解者（「國語解者」包括下面四類人：1.公學校及教育所兒童。2.公學校及教育所卒業生。3.國語普及設施生徒。4.同修了者（國語普及設施修完課程者））」為人口的51%，1943年更上昇至80%。惟其官方算法中的第3和第4類，過於寬鬆，實有再加參酌之必要。

¹¹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歷史與文化第三屆研討會論文集》（五），2000.02，頁65-83。

¹² 當然，也有像周婉窈（1995：140-145）所述，沒到過日本留學卻能流利地使用日語，如黃鳳姿和龍瑛宗等人存在。

¹³ 基隆市國語研究班（1932：17-28）〈話方科に於ける劣等生指導法の研究〉，《國語教育諸問題（續編）》。

國語らしからぬ國語、國語をなさない國語、どうして斯うも成績が擧らないのかとは方々の学校で話題に出る處であり、又種々なる實地調査や實力査定などに示される處であるが、(後略)(p. 18)

全校千五百名の兒童中、五百名近くは殆ど劣等生と名付けてよいものである。(p. 19)

我們可由《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¹⁴得知日治時期臺灣兒童的就學比率。(表一)

表一 日治時期臺籍兒童就學率

年 代 (年)	1904	1909	1914	1920	1925	1930	1935	1940	1944
臺籍兒童就學率 (百分比)	3.8%	5.5%	9.1%	25.1%	27.2%	33.1%	41.5%	57.6%	71.3%

試以 1944 年為例，當時未能入學的兒童人數百分比為 28.7%，就學兒童的劣等生數百分比約為 23.7%，兩者相加為 52.4%，亦即，未能學得基礎日語的人數，於就學率較高的日治後期（1944 年）來看，仍然超過一半。

接著，讓我們探討一下當時有關語言學上日語教育的其他問題。

2.2 相互轉訛音誤

宇井音（1919）〈臺灣人國語發音轉訛圖〉即指出三十個當時臺灣

¹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政府，1946），頁 1241。

人發日語時相互轉訛音誤的地方。(表二)

表二 宇井音(1919)〈臺灣人國語發音轉訛圖〉(摘錄)

(一)「イ」列音と「ウ」列音との相互轉訛	イシ(石)＝ウシ(牛) ナシ(梨)＝ナス(茄子)	一般殊に蕃人に多し
(二)「イ」列音と「エ」列音との相互轉訛	イキ(息)＝エキ(益)	同上
(三)「ウ」列音と「オ」列音との相互轉訛	ウシ(牛)＝オシ(唾) フネ(舟)＝ホネ(骨)	同上
(四)「バ」行音と「パ」行音との相互轉訛	バン(晩)＝パン(麵)	廣東族に多し
(五)「バ」行音と「マ」行音との相互轉訛	ボン(盆)＝モン(門) ジバン＝ジマン(自慢)	一般
(略)		
(十一)「ダ」行音と「ラ」行音或いは臺灣「ラ」行音との相互轉訛	ムダ(徒)＝ムラ(村) コドモ(子供)＝コロモ(衣)	同上 ¹⁵
(以下略)		

由表二可知，除了轉訛音誤之外，還需要注意二個地方，1. 是指出依據「番人」、「廣東族」和「一般人」人不同，而常犯的訛音錯誤有所差異。2. 是提出其有可能與臺灣「ラ」行音的轉訛音誤。亦即，轉訛音誤會依族群而有所不同，且亦受母語音韻之干擾。

2.3 臺灣式日語重音 (accent)

¹⁵ 指「一般」。

日語的重音，基本上，依地區不同則不同，日語的各地區方言，即為最好的例子。但是，麻煩的是，即使在同一個地區，依時代不同，方言的重音（accent）亦會產生變化。《日本語学研究事典》的〈アクセント（accent）〉一項，便有如下之說明¹⁶。

（イ）地域が違えば語のアクセントも異なる。日本の諸方言アクセントの違いがそれで、例えば、山・川・犬・馬などの語のアクセントは東京方言では○●（低高）型であるが、京都方言では●○（高低）型である。

（ロ）同じ地域でも時代によってアクセントは違う。例えば、東京方言で電話・赤とんぼ、のアクセントは、明治・大正時代は●○○（高低低）型・●○○○○（高低低低低）だったが、現在は○●●（低高高）型・○●●○○（低高高低低）型である。この結果、アクセントは時代とともに変化する性質がある。

再者，周婉窈（1995：144）指出：

來台的日本人大部分來自日本邊陲地帶的九州。根據一九四〇年10月1日的調查，當時在台灣日本人共三十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人，其中三萬九千九百九十八人（12.8%）來自鹿兒島，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九人（10.1%）來自熊本，一萬八千二百零六人（5.8%）來自福岡。這三個地方都在九州，依次高居前三名，東京遙居第九名，共一萬零八百一十八人，只佔全部在台日本人口的3.4%。

我們可知，當時臺灣人的日語重音，直接（或間接）地受其日語

¹⁶ 櫻井茂治執筆，飛田良文等編《日本語学研究事典》（東京：明治書院，2007），頁365-366。

教師的影響。寺川喜四男（1938）《北部臺灣に於て福建系本島人の使用する國語 國語のアクセント研究》中就已指出日治時期居住於臺灣北部福建系的臺灣人的日語重音，具獨自之形式上的特異性。該類日語重音與日本任何地方都不同，在此，姑且稱之為〈臺灣式日語重音〉。

2.4 臺語式日語（臺灣國語）之謬誤

臺灣教育研究會（1940：297-301）《話し方教育の諸問題と其の回答》中，特別記載〈臺灣語的國語〉一項，並羅列其誤用例。試摘錄以下十例。

1. アノヒトリ（アノ人）
2. 今日ノ朝（ケサ）
3. ウソニナキマシタ（ナキマネヲシマシタ）
4. 市場へ行ツテヤサイヲ買ヒニイキマシタ（行ツテ不要）
5. オカアサンハ私ニイツテ一時ニカヘリマス（オカアサンガ一時ニカエリナサイトオツシヤイマシタ）
6. 菓ヲタベタ（ノンダ）
7. アイヨー寒イ（オ、寒イ）
8. アノ一臺の自動車（一臺ノ不要）
9. 筆ヲモツテ字ヲカキマス（デ）
10. 木ガ死ンデイマス（枯レテイマス）

我們可以察知，不分品詞、亦不分詞語與文法，以上皆為受到母語影響後的誤用例子。一般稱此為第一語言之轉移或干涉（transfer/interference）。而母語之轉移或干涉，其影響範圍包含學習語言之各層面，如音韻、詞彙、文法、表記（書寫方式）等，與此相關之研究，且容他稿再述。

2.5 日語教科書之影響

日治時期的日語教育，首授聽說（會話），漸而擴展至讀寫方面。1936年發行的《新國語教本教授書 卷一》（第二版）¹⁷的緒言中明載「本書ハ話方中心主義ヲ採リ（略）」¹⁸。在此，試摘錄以下之部份內容¹⁸。

一 教材

表現形式 コレハ何デスカ。

コレハ○デス。

語句 椅子・黑板・机・オルガン・白墨

發音 ハクボク

二 準備 椅子・黑板・机・オルガン・白墨

三 指導要領

(1) 動作と共に話を聴かしめて耳に馴れさせる。

コレハ椅子デス。

コレハ先生ノ椅子デス。

・・・コレハ生徒ノ椅子デハアリマセン。

コレハ生徒ノ椅子デス。

・・・コレハ先生ノ椅子デハアリマセン。

(2) 命令法によつて動作せしむ。

○○サン、椅子ヲ持ツテオイデナサイ。

コレハ何デスカ。・・・コレハ椅子デス。

サア、オカケナサイ。

オ立チナサイ。

椅子（コレ）ヲ持ツテイキナサイ。

¹⁷ 臺灣教育會《新國語教本教授書 卷一》（第二版）（臺北：臺灣教育會，1936），頁2。

¹⁸ 臺灣教育會，前引書，頁4-6。

椅子ヲソコヘオキナサイ。

(3) 話方

(イ) 談話として

コレハ椅子デス。

(ロ) 會話として

コレハ何デスカ。・・・コレハ椅子デス。

(4) 發音練習

母音

子音

濁音 デ・バ・ガ・ボ

中田敏夫(2003:137)〈《台湾教科用書国民読本》の国語学的研究〉¹⁹的結論，有以下之敘述。

国民読本に描かれた教科書用語について、語彙、文法、表記に分けてその実態をみてきた。内地においてさえ標準的言語が確立されていなかった状況で、台湾総督府は民政部学務課、国語学校、国語教授研究会、教科書編纂者が総力を挙げて、その構築に当たった。

如同以上中田敏夫所述，日治時期從日語教科書中學習到的日語，是受過整理、統一並簡潔化的日語。其中，有些地方的標準化甚至於比當時日本內地的教科書還早。但這對只能從那些教科書才能學得日語的學生來說，他們學到的只是教科書式日語（整理、統一並簡潔化的制式日語），並非活生生的非制式日語。這亦無怪乎山崎睦雄（1939:58-59）《國語問題の解決》中所提之親子間用「敬語」來對話之奇怪現象了²⁰。

¹⁹ 收錄於吳文星、周婉窈、許佩賢、蔡錦堂、中田敏夫、富日哲編《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3）。頁，93-141。

²⁰ 引自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

父 「あなたは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子 「私は一寸友達の家に行きました。お父さんは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父 「私は役場に行きました」
子 「まだ帰りませんか」
父 「あなたは先に帰りなさい」
子 「さよなら」

3 日治時期與現今臺灣日語教育之比較

3.1 語言學習之臨界點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民國政府禁止使用日語，直至 1963 年，當時的中國文化學院（現今之文化大學）設立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後，臺灣之日語教育才重新開展，橫互其間的是長達十六年之久的日語教育斷層期。爾後，學習日語的人口逐漸增加，2006 年度達至 191367 人。其中，超過五成的日語教師和日語學習者在高等教育機構內（如表三²¹）。

表三 臺灣之日語教育機構數、教師人數和學習人數（2007 年）

	機 構 數	教師人數	學習人數
中等教育	252	667	58198
高等教育	156	1652	118541
學校教育以外	105	472	14628
合 計	513	2791	191367

其問題》（《新史學》第 6 卷第 2 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1995）。頁 136。

²¹ 《台灣日本語教育事情調查報告書》（臺北：日本交流協會，2007 年）。

據統計，2007年我國留學日本人數為4686人²²。以上各項的學習人數，當然無法和日治時期相比。在此，吾人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於現今在臺灣的大專院校的日文相關科系，才具有較佳之日語學習環境。但是，大學生的入學年齡多已十八、十九歲，恐怕早已超過前述第二語言學習之黃金時期（臨界點）。

另外，如前所述，日治時期的日語教育一開始便以日語教授，皇民化時期對本土語言多所限制、強行推廣普及日語政策（國語家庭等），這些對塑造語言學習環境來說，亦有相當之助益。

3.2 相互轉訛音誤

現今（2009年）之臺灣，是典型的雙語併用社會，不論各族群（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等），一般在臺灣的人皆已精通本身的母語方言和標準語中文，而族群之區別亦已融合淡化，故日治時期所提及的因族群不同而相互轉訛音誤的現象，幾乎已不復存在。對於臺灣人來說，在已習得的語言中並不存在的日語音聲中有聲和無聲（如「バ・パ」、「ダ・タ」、「ガ・カ」）的對立，可能才是現今學習日語音聲上面的重大課題²³。

3.3 臺灣式日語重音（accent）

土岐哲（1995：26-43）〈アクセント〉一文中，一開始便有如下之敘述²⁴。

外国人に日本語のアクセントを教えることについては、
よく消極的な意見が聞かれる。しかし、だからと言って、

²² 《我が国の留学生制度の概要—受け入れ及び派遣—》（東京：文部省高等教育局学生支援課，2008），頁9-10。

²³ 小谷修執筆〈音声教育の問題点〉，日本語教育学会編《日本語教育事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頁，9-14。

²⁴ 日本語教育学会編，前引書，頁26。

アクセントに何らかの問題を持つ日本人なり外国人なりがいかなる場所においてもそのまま全く無条件に受け入れられているわけでもない。

(中略)

そのような学習者に初歩の段階から少しずつでも具体的なアクセント教育がなされたならば、上の段階に進むにつれて上達の度合いにも加速度が付くのであり、その実例は日本国内に限らず広く見うけられる。

對於臺灣式日語重音之相關問題，除了前述之寺川喜四郎的研究外，野澤素子亦有相關之探討²⁵。臺灣式日語重音（accent）的現象至目前為止，似仍未見改善。國內對日語重音（accent）的教育研究，似仍有加強之必要。一般的日語教科書，在日語重音（accent）的編輯上，亦較少著墨。此外，建議國人將來在留學日本時能將留學地區、或教育單位在應聘日籍教師時能將其出身地或能否說正確標準日語重音等事項列入思考範圍。

有關「臺語式日語（臺灣國語）之謬誤」問題，於現今可能已由「中文式日語謬誤」替換。此類屬日語語言學「誤用文分析研究」之範疇，依其受第一語言之干擾、日語能力之程度而有不同，在此不再贅述。但是，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外國人之日語誤用問題，對日本人的日語語言學者來說，反而是一個內省並研究自己母語（即日語）的良好切入點²⁶。最後，關於「日語教科書」的問題，現今臺灣的日語教科書幾乎包羅萬象，除此之外，亦有種類繁多的多媒體教材，甚至連日本的電視節目都能與日本當地同步收視。因此，吾人可說，像日治時期受限教科書之影響，而發生前述那種語用謬誤的可能，已大為

²⁵ 野澤素子〈台湾人留學生の日本語に於けるアクセントの傾向について〉《日本研究》3號（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国際センター，1973）。

²⁶ 如寺村秀夫《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 I》（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82）和森田良行《誤用文の分析と研究—日本語学への提言—》（東京：明治書院，1985）二書中所載。

降低。

4. 結語

綜合以上之論述，我們可以整理出以下幾點結果。

- (1) 在臺灣人學習日語的歷史上面，日治時期具備不受語言學習臨界點之限制，而達至精通日語之境界的可能。而其中，又以皇民化運動時期的語言環境最佳。相對地，戰後在臺灣的日語學習者，則無彼之語言學習環境。
- (2) 日治皇民化時期，臺灣總督府雖如火如荼地推行日語教育，但是實際上，臺灣人未能習得日語的人數依然不少。另外，因為一知半解或制式教科書等的影響而導致在日語之音韻、詞彙、文法等各方面，容易產生臺灣式日語之謬誤。
- (3) 日治時期就已存在的臺灣式日語重音（accent）的問題，至今仍未獲改善。

{ 附記 } 本論文以 2009 年 9 月 25 日臺灣日本研究學會之發表內容為底稿。會中承蒙各位先進不吝給予指教，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參考文獻

1. Johnson, Jacqueline and Elissa Newport 1989 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 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gnitive Psychology* 21:60-69.
2. 中島平川編 2005 《言語の事典》，東京：朝倉書店。
3. 文部省高等教育局学生支援課 2008 《我が国の留学生制度の概要—受け入れ及び派遣—》，東京：文部省高等教育局学生支援課。
4. 日本交流協會 2007 《台湾日本語教育事情調査報告書》，臺北：日本交流協會。
5. 日本語教育学会編 1995 《日本語教育事典》，東京：大修館書店。
6. 矢内原忠雄著，林明德譯 2004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7. 宇井音 1919 〈臺灣人國語發音轉訛圖〉，臺北：新高堂書店。
8. 寺川喜四男 1938 《北部臺灣に於て福建系本島人の使用する國語 國語のアクセント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言語學會。
9. 寺村秀夫 1982 《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 I》，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10. 吳文星 1987a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上)〉《臺灣風物》第 37 卷第 1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11. 吳文星 1987b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下)〉《臺灣風物》第 37 卷第 4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12. 吳文星、周婉窈、許佩賢、蔡錦堂、中田敏夫、富日哲編 2003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3. 沈 陽 2005 《語言學常識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4. 周婉窈 1994 〈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新史

- 學》第 5 卷第 2 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
15. 周婉窈 1995 〈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第 6 卷第 2 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
 16.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 2000 《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17. 飛田良文、遠藤好英、加藤正信、佐藤武義、蜂谷清人、前田富祺編 2007 《日本語学研究事典》，東京：明治書院。
 18. 基隆市國語研究班 1932 〈話方科に於ける劣等生指導法の研究〉《國語教育諸問題（續編）》，臺北：臺北州教育會。
 19. 森田良行 1985 《誤用文の分析と研究—日本語学への提言—》，東京：明治書院。
 2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1946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政府。
 21. 臺灣教育會 1936 《新國語教本教授書 卷一》（第二版），臺北：臺灣教育會。
 22. 臺灣教育會 1973 《臺灣教育沿革志》（複刻版），臺北：古亭書店。
 23. 蔡茂豐 2003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上）》，臺北：大新書局。